

# 突破贫困地区教育困境

■本报记者 韩天琪



范先佐 刘颖

近日,“常熟童工事件”得到社会广泛关注,事件中的童工多来自边远贫困地区。这使得边远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和扶贫问题再次引发讨论。

## 经费不是问题所在

“国家现在对贫困地区,尤其是民族贫困地区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支持力度还是比较大的。通过‘两免一补’政策的实施,贫困地区的孩子上学基本不需要交钱。可以说,经费问题现在不是问题所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范先佐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下贫困地区孩子只要上学,不会存在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的问题。”

在前不久召开的第四届中国乡村文明发展论坛上,北京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讲师刘颖根据其实际调研案例介绍了墨脱县的义务教育情况,“在经费方面,‘三包’经费按每生每年3000元和营养改善经费每生每年800元的标准发放到各执行学校。今年秋季开学后,全县开始执行每生每年3100元的‘三包’经费政策。截至2016年10月,全县共支出教育经费3990万余元,其中‘三包’经费支出551万余元,‘营养改善计划’经费支出102万余元。”

范先佐认为,有些问题不是钱能解决的。农村教育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如何体现更关乎观念和教育的实际需求。

## 教育脱贫困难重重

据刘颖介绍,大多数贫困地区,尤其是民族边境贫困地区受到交通、环境等因素的制

约,解决贫困的难度明显增大。

“首先,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生态环境恶劣、自然资源贫乏、地理位置偏远的地区,这是扶贫工作中难度最大的部分。同时,由于自然环境恶劣,灾害频发,因灾致贫、因病致贫、因学致贫等现象时有发生。其次,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很多农牧区基础设施主要依靠国家投资建设,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尤为落后,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最后,贫困地区的人口整体素质较低。大部分贫困人群中,小农意识十分浓厚,靠天吃饭的现状没有根本扭转。同时,贫困群众的文化与生产生活技能的缺乏,自身脱贫的需求和能力欠缺,商品意识、竞争意识淡薄,及部分群众存在的等靠要思想也是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刘颖说道,“在这种现状下,基础教育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尤其在少数民族地区脱贫中更显示出其基础性作用。”

“贫困地区面临的教育困境首先体现在稳定教师队伍难度大。在稳定教师队伍方面,虽然上级各相关部门也出台实施了不少优惠政策,但由于地理位置、交通环境、生活条件等原因,教师队伍仍然存在频繁调离的现象,致使有资质的骨干教师流失严重,进而影响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此外,还存在教育基础设施不完善现象。很多地方存在基建生均指标达标,

现实需求却不达标的矛盾现象。三是师资力量短缺,教师专业配备不合理。以墨脱县为例,墨脱县各校普遍存在教师专业配备不合理的现象,特别是物理、化学、藏文及艺术类专业教师短缺十分严重。目前,墨脱县共有231名教师,其中非师范专业教师45人,占教师总人数的18.5%。各校大部分教师都是跨专业教学,由于缺乏专业知识,致使授课难度大,授课效果不理想。”刘颖表示,虽然在国家政策的大力倾斜下,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现状已经有了明显改善,但由于这些地区发展起点低,教育脱贫道路仍显得困难重重。

## 因地制宜,对症下药

当“钱”解决了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时,什么才是依靠教育脱贫的关键所在?

“国家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政策保证了即使贫困地区的孩子也不会因为学费问题而辍学,那为什么现在很多贫困地区的孩子仍然要选择不上学呢?我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孩子对未来的现实考虑。”范先佐说道。

范先佐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提供的教育满足不了贫困地区孩子的需要。“贫困地区的孩子可能上不了大学,或者上不了好

## 声音

# 开放获取是中国科技出版新机遇

■张秀宁

任何国家的科研成长和发展都与研究经费的投入成正比。近年来,我国对科学研究的经费投入越来越多,已经占到全球科研投入的20%,数量仅次于美国。仅2015年,我国在研发方面就投入了1.4万亿元人民币,占GDP的2.1%。同时,我国还拥有370多万全职科研人员,绝对总量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不断攀升的科研经费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大量优秀研究论文涌入学术出版体系,发表论文愈加成为一种刚性需求。但现实情况却是,只有少数被挑选的“高影响力”期刊在吸收研究论文,这远远满足不了研究者的发表需求。研究论文之“众”与科研期刊之“寡”正日渐成为一个突出的矛盾。

科学出版的情况并非没有改善。目前全球科学出版物的数量增长很快,自2008年来增加了23%。来自中国的出版物数量在5年内增加了近一倍,占世界总量的近20%,而这—比例在10年前仅为5%。但是,这仍然无法满足科研人员发表论文的需要,在过去4年中,中国是向世界顶级科学期刊投稿情况改善最多的国家。根据“《自然》杂志2016新星指数”,在他们长期跟踪的40家中国科研机构中,有24家的科研论文产量增加了至少一半。中国在4个研究领域——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和地球与环境——中的论文投稿量增长方面居领先地位。科研刊物与发表需求之间的不匹配并没有随着科学出版物的增多而改善,单纯提高出版物数量也不足以满足科研的现实需求,这意味着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科技出版格局。而“开放获取”的出现,则为解决上述现实矛盾,开辟未来科技出版的新局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遇。

相对于传统的科研出版模式,开放获取具有很多不可比拟的优势。

首先,它将推动学术出版行业的产业变革与转型。严谨的出版流程是保障科研论文质量的必要条件,一定的利润是商业出版机构维持科研论文出版业务的前提。而发表论文的支出要么是由读者买单,要么是由作者买单,在传统的出版模式中是以前者为主。由

知识的获取者来负担知识承载和传播的成本,这看起来是很合理的,但实际上,由于科研内容存在冷热之别,读者群规模的大小不能代表研究问题重要性的大小,却能决定一个期刊收入的多少。而随着人类知识体系的不断扩展,学术分科的趋势是越来越细,这也意味着“冷门但重要”的学术分支会越来越多,长远来看,传统的由读者付费的科研出版模式显然不可持续,甚至将阻碍科研的进步。因此,出现作者付费的期刊就是自然的,这意味着由学术界自筹经费来承载和传播新知识。而作者付费,恰恰是开放获取的根基。所谓“作者付费”,其实主要是作者所在的学术机构付费。为了维护科研地位与科研经费,学术机构并不缺乏付费动力。实际上,在传统出版模式中,作者同样支付了大量审稿、校对、出版费用。而开放获取的出版流程主要是基于网络平台,其运营成本远低于传统的出版模式,这就意味着,运营开放获取期刊,收费可以远低于传统期刊,这又反过来增加了作者付费的动力和可行性。

其次,开放获取使科研信息更有效地进行流通,大大提高了科研的效率。随着科研资金和研究人员的不断增长,学术产出会越来越多,而传统的学术出版业压力已经越来越大,不能应对学术增长和传播的压力,依赖于数字技术的开放出版无疑将优势渐显并成为主流。通过开放获取,文献和期刊将实现“影响力升级”。根据 Steve Lawrence 的研究,文献可免费获取的难易程度与其被引用率明显正相关,文献越容易被获取,就越容易被引用。显然,基于互联网的开放获取期刊更加吻合学术出版的本质——促进学术交流、推动学术进步。

第三,开放获取能够矫正现有学术评价的问题。目前的学术评价指标体系已经引起了诸多的批评,越来越多的科研工作者认为,期刊评价指标,尤其是对期刊影响因子的过于偏重已经严重影响了学术评价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真正重要的评价指标对象仍应该是研究论文本身,而不是文章所发表的刊物。论文的被引

用频率、在社交网络上的讨论和使用热度、出现在政策档案中的频次、被引用在百科词条中的数量等等都将成为新的数据点。随着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对数据研究的文章和新的计算方法会产生更具有影响力的评价指标,但不论出现何种指标,都应该是学术文章本身为对象,而不应依赖于学术期刊的背书。开放获取显然进一步剥离了学术文章与学术刊物,使出版机构回归到学术出版的原点——组织学术、服务学术、推进学术,避免了学术上的买账还珠。

从全球科研发展的趋势来看,欧美国家在开放获取领域已经有了十余年的积累,在理念与经验上都走在世界前列。全世界大部分较具科研实力的研究型大学,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等国的国家科研基金以及一部分私人科研基金,都已采用强制性开放获取政策。2015年,在总共1.14亿在线英文学术文献中,已有超过2700万实现开放获取,占24%;预计在2016年,这个比例将超过50%。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开放获取期刊的科研影响力和质量正在接近传统期刊,开放获取被广泛采用只是时间的问题,能否抓住开放获取这一科研出版的趋势,成为未来我国科研竞争能力发展提高的一项重要挑战。

因此,中国应该抓住科技出版由传统模式向开放获取转型的关节点,在充分借助互联网技术力量的同时,充分调动现有资源,在政策、资金、人员等方面向科技出版的开放获取倾斜,实现弯道超车,更好地为中国的科研事业保驾护航。(作者单位:南京邮电大学)

## e 见

从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到产品是一场接力赛;大学和中科院的研究成果是第一棒,而以生产为主的企业则是第四棒。我国的科研成果依然转化难的症结(假的不需转化)在于总想将第一棒和第四棒衔接。我国没有阶段性技术的交易市场和交易机制,没有第二和第三棒;而从事第一棒研究的技术科学家(engineering scientists)急需有人接盘,才能合理获利,从不熟悉的后期开发工作退出,投入下一项科学发现或技术突破。不必担心我国的民用技术卖给了外国。36年前,我国的制造业关门来只为中国人民服务,我们什么都缺,自行车尚是家庭的重要资产;后来我国的制造业敞开大门为全世界人民服务,我们什么都过剩了。技术同样会如此,阶段性技术的交易机制所提供的不仅是钱,更是经济利益考量下的科研成果来自治式评价。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0942-1014228.html>

金拓《在科学院学部学术伦理研讨会上的讲话》

攻读博士学位是一个极为严肃而神圣的学术经历。我们经常用“攻读”和“深造”来表达通往博士学位的求学过程。博士应该是接受了完整的学术训练,具有独特和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独立思考能力的思想家(Doctor of Philosophy)。获得博士的过程应该是经历一场炼狱般的学术生命进化的过程。保证博士论文的学术质量,也就是保卫学术的尊严和尊严。这也是一个唇亡齿寒的道理:如果学者不能在博士论文把关上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放过的那些“漏网之鱼”将以另一种方式扼杀学术的社会声誉。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20090-5-1017131.html>

冯兆东《博士论文不能与SCI论文相提并论》

极大繁荣的高等学校教材出版,给出版社带来丰厚的效益,给作者带来了学术声誉和经济收益,但教材质量也呈现出急剧下滑的趋势,低水平重复出版、内容拼凑抄袭等现象层出不穷,质量口碑呈断崖式下跌,几乎成为高等教育质量下滑的一个显著标志和炮轰目标。相比较于已经发展数百年的国外高等教育,中国高等教育还很年轻,高校教材建设放开的时间更短,未来还有更长的路要走。选择经典教材还是定制教材,不只是老师需要回答的问题,更需要考虑学生的需要,符合因材施教、科学育人的要求。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81848-8-1012899.html>

范运年《高等学校教材出版,缘何乱象频发?》

(栏目主持:沙森)

## 漫话

# 导游讲解要传承历史而非“野史”

■沙森

近日,《北京市旅游条例(草案修改稿)》提交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修改稿中明确,对于北京市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故宫、天坛、颐和园等景区,应逐步实行讲解员管理制度。有媒体披露,不同旅行社导游在故宫、颐和园跟团提供讲解服务时的解说词各不相同,甚至会随意穿插大量未经考证的传闻、野史。

很多旅游景点对讲解内容没有明确要求,导游词一般都都比较概括、简单。实际讲解过程中仅靠导游词往往不够,旅行社也不会对导游讲解词作具体规定,所以需要导游自己补充讲解内容。有的导游会深入研究景点历史,为游客提供历史的细节,也有的导游讲些道听途说的八卦野史,甚至干脆杜撰,根据自己的想法胡编乱造。

人文景观的最大价值在于其人文历史价值,这种价值应当被当作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珍视。

从这个角度讲,景点讲解拒八卦,是十分有必要的。在具体实施层面,首先要加强对导游等人员的培训和管理,导游自

身也应加强自我学习,从不同角度呈现一个有趣、有味、有内涵的真实景观。其次,要完善讲解员管理制度,讲解时,必须讲有史料依据、有据可查的内容,让讲解规范化,提升讲解员队伍素质与水平,从而更好地为游客服务,让人们正确认识历

史,而不会被一些野史、传闻所迷惑与误导,让历史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

要让历史遗迹、人文景观真正传承下去,不仅要保护好诸如历史文物等物质文化遗产,也要重视历史本身的传承,这本身也是一种对历史文化及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涂梦紫供图

## 论道

服务型政府并不仅仅是把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进行物化,服务型政府更重要的是需要重视服务能力建设。由于政府的预算约束,使得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不太关注需求,从而使公共服务的供给脱离实际。因而服务型政府还应加强政府对服务需求的甄别能力的建设。此外,要不断提升服务意识与服务水平的提升,而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激发行政管理者的主体性,使行政管理者的主体性在差异化理解中得到充分呈现。

服务型政府应在后工业社会的差异化要求下来理解。如果还秉承工业社会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还把服务型政府当作一种实体化的东西去着力建设,这还是在走工业社会的老路。遗憾的是,一些地方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中还是基于一种物化的理解,满足于服务设施的建设,以为这样就是服务型政府的核心。这其实并没有抓住服务型政府的本质。服务型政府作为一种全新的政府类型与范式,是对管理行政的否定与提升。这样在管理行政所提供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服务型政府的核心就在于差异化的基础上,如何提升政府的服务能力,这种服务能力不仅仅在于政府服务的供给能力,还在于服务的辨别能力,而这种服务的辨别能力主要不在于政府自身,而在于其他社会主体的成长与自我表达,在这个基础上,需要

政府对社会的多样化的服务需求有着清晰的辨别。这样,服务行政就取决于主体间的良性互动与表达,取决于主体间的互相承认,取决于政府不再是自我中心式的自我服务,而是在对他者的承认的基础上,通过他者的承认来获得自我存在的合理性,也就是说,服务行政下的政府是“他在性”的自我,这样,服务行政下政府服务能力就在于与这一个主体间的持续的互动过程中不断提升。

服务型政府从提出到现在,经过各地的丰富实践,确实有效地推进了服务型政府建设。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在理解服务型政府时还存在着某种偏差。因此,我们在这里提出服务型政府更要加强服务能力建设。根据我们的理解,完整的服务能力应该包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服务需求的甄别能力与服务意识及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目前一些地方把服务型政府的核心放在了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建设上,虽然这是服务型政府甚至是服务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但问题在于,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仅仅是服务能力的一个方面,这种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在很多情况下是过度供给,而在某些情况下又造成了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换句话说,政府在哪些方面提供的公共产品超过了社会需求,而在另外一方面又无视某些公共产品的供给。比如,某些地方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为农村建设了健身器材,建立了农村书屋。尽管这些东西建好了,但农民并不买账。健身器材并没有人去使用,书屋里也全是灰尘。一些地方花巨额资金,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建设的公共自行车系统,利用率却不高,原因何在?

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公共产品的生产方式具有特殊性。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生产是和需求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生产者是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来决定自己的产品数量以及生产什么。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生产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及时了解消费者或者社会的需求,从而保证供需平衡。但对公共产品的生产来说,用需求约束生产者的产品产量则无法得到合理解释。对公共产品的生产来说,其公共产品的提供是由预算决定的,也就是说,公共产品的提供无法由市场的供需原则来决定,也不能由单位价格的预算方式来决定产品数量,而是以预算拨付的方式来确定产量的。这就意味着公共产品的生产方式具有很大的特殊性,正是这种特殊性造成了公共产品的过度供给或供给不足。而无论是过度供给还是供给不足都是无效供给。尽管政府提供某些公共产品时充满了善意,但从其结果来看,这种善意却没有达成善果。

如果我们从政府自身来寻找问题症结的话,由于无法摆脱的自利性及封闭性,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这种特殊性而引发的问题是无法得到有效解决的。而且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的服务理念、服务方式以及政府的治理方式的话,这种服务型政府空有服务之名,而行管制之实。由于我们还是把服务型政府从物化的意义上去理解,因而也就满足于从标准化、量化的角度去考虑,我们提供了多少服务,至于这些服务是否有效,是否是真正社会所需要的公共服务,我们根本不去考虑。公共服务有其名而无其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服务行政可能会导致强制服务、单一服务、随意服务以及不平等服务。即政府从自身的角度来考虑,提供它自认为合适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也正因此,政府可能会提供一些社会上并不需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有些服务甚至成为摆设,成为显示政绩的陈列品。同时,由于把公众排除在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生产过程之外,使得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处于封闭状态之中,也就造成了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随意性,公民只能被动地接受政府的服务。

(作者系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

# 服务型政府应重视服务能力建设

■王锋